

清华名人故居有名无实保护难

本报记者 吕天璐

百年清华一向受媒体青睐。去年底,清华早期著名建筑清华学堂在修缮过程中遭遇火灾便轰动人心;而近期,一则关于清华学名人故居成大杂院的消息再度引发关注。对此,一位清华老教授坦言,清华对于校内的名人故居重视程度不够,连老校长梅贻琦的住宅也都拆掉了。

大杂院存在严重消防隐患

被非议的新林院和普吉院,位于清华南门附近,是一片有着70多年历史的院落群,如果加上它附近的照澜院、胜因院,这个从南门外到二校门之间的小片空间,便是清华内的近代住宅群。

4个院落群中,胜因院虽然被拆掉了一部分,但剩余的住宅旧貌依然,中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校友会办公楼,包括杨振宁在内的一些大师也住在其中,保护和管理的相对较好。其他的院落则除了青砖垒起的墙体,数十棵需两人合抱的老树,更多的是招租小广告、打满隔断的地方、应届大学毕业生和考研大军。置身其间,你已经很难找到历史的痕迹。而在百度上输入“普吉院”“新林院”,最多的是“存在消防隐患”“平房出租”“床位出租”等字样。

记者看到,新林院的大多数院子都在私搭乱建,有的是砖瓦房,有的则是彩钢房。这些房子大多和原有建筑共用一面承重墙,从其新旧度判断,也有了一些年头。除了院内,不少房子拆掉了院墙,向外扩张。这些小房间大多建得匆忙粗糙,甚至没有加固措施,都靠主体建筑承重。

由于院子里多了不少原先不存在的房子,空间相当局促。电线在空中交叠,从院外的电线杆上拉进来,再被拉往不同的房间。有的电线则被人当成了晾衣绳,上头挂着整排半湿的衣裳,电线软软地垂在半空,人往往要低头才能从下头走过。整个院落因建造时间久远,并没有设计消防通道,不少院子的间隔甚至不够一辆普通轿车进出。记者发现,居民家中鲜有防火设备,而数十个院子中间,只有一个地下消防栓。

昔日,这里名人无数

这里的租客恐怕不知道,几十年前,蒋南翔、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钱锺书……这些鼎鼎有名的大家们,也曾一同居住在这片院落中。

照澜院是这其中最早建成的,那时它被称作“南院”,建于1921年,专门给教授住宿,包括清华校史上最受尊敬的校长之一梅贻琦、历史学家陈寅恪、语言学家赵元任、新红学派创始人俞平伯都曾安居于此。

随着清华的发展壮大,校内的教授渐渐增多。1934年,在南院的对面,新南院建了起来。随后的1937年,在新南院的西南方位,又建起了新新南院。“新新南院”,又建起了新新南院。“新新南院”,又建起了新新南院。在昆明的清华校友会正式把它定名为“普吉院”,以纪念清华在昆明“普吉村”曾设立研究所。”著名经济史学家陈岱孙这样对清华的后辈回忆这段历史,抗日战争胜利后,南院和新南院定名为“照澜院”和“新林院”,由朱自清先生提议,取其谐音。

随后,越来越多的老师住进了这里,这其中包括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哲学家金岳霖、文学研究家钱锺书、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第一位校长蒋南翔等。

同年,在照澜院西南角,新的院落也建造了起来。为了纪念西南联大时期,清华曾租用为校舍的昆明胜因寺,以及抗战的刚刚胜利,这里被命名为“胜因院”,包括梅贻琦、费孝通、施嘉扬等都住过这里。

新林院8号:国徽的诞生地

新林院8号是北京另一处梁林故居。1946年,林徽因回到了阔别近10年的北京。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梁思成致函母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我国各大学宜早日添授建筑课程,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今后数十年间,全国人民居室及都市之改进,生活水准之提高,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复员北京之际,在工学院增设建筑工程学系,梁思成受聘为教授兼系主任。于是,梁思成和林徽

因就搬到清华大学的新林院8号居住了。几年以后,他们又迁入校内的胜因院居住。

新林院8号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小院,新中国成立前夕,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为解放军编绘了《北平文物建筑保护目录》,梁思成成为新中国国旗修订方案,并绘制标准图样,而作为新中国国家象征的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以及中南海怀仁堂改建方案,也都出自这里。新林院8号成为凝聚新中国建国历史罕有的实物史证。

对于新中国国徽的设计经过,梁再冰回忆,1950年6月,家里的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好像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妈妈正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其他一切似乎都暂时忘记了。”建筑系的师生们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往日这里的下午茶聚会也变成了浓厚的“国徽氛围”。

当时的建筑系教师郑孝燮还依稀记得:“为进行重大设计工作的需要,客厅中临时增设了高大的绘图桌。建筑系参与设计的教师围拢绘图桌对方案进行评论修改。”这份凝聚着清华建筑系师生集体智慧和梁思成、林徽因艺术才华的国徽方案,就这样在新林院8号诞生了。

林徽因住在新林院8号时,仍保留了抗战前住在北总布胡同时的“午后茶聚”习惯。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

夫妇、陈岱孙是座上客,还有建筑系的教师,都会聚集在这里。林徽因依然是茶聚的中心,她无论谈论什么都语言生动,引人入胜。

不是文保单位,所以无人管理

其实,早在2009年,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梁思成故居的保护引起争议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局就明确表态,位于清华大学的另一处梁思成故居,即新林院8号,也应予以保护,并表示将与规划、清华校方等单位共同研究,做好相关建筑的保护工作。

然而,保护显然未得到落实。清华大学建筑规划学院老教授朱自焯直言不讳的表示,这一大片故居确实存在保护价值,而且也急需保护。但由于它们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所以目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惟一的例外是新林院8号乙,梁林故居的客厅部分。之前,单独出租,前年,一拨有心的清华学生将这里租了下来,布置成一个咖啡吧,以纪念梁林二人,也为了保护这里不再被一拨拨的承租者破坏。现在的经营者、清华大学的何老师表示,之前的历任经营者都是以亏本收尾。而刚刚于7月1日接手这里的她也没打算靠这个小店赚钱,“就是想在这里较好地保护起来”。

据悉,今年,新林院8号梁林故居终于进入了文物保护普查名单。

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

采访中,照澜院的张先生对记者说:“我在这里已经住了50多

年,虽然产权还是学校的,但给我租房我也不愿意搬。这里的房子住得可舒服了,层高有3.7米,木地板有半米厚,冬暖夏凉。”

张先生的话正是清华落实有效保护的两大难点:一,产权归学校,住户没有积极性对房屋维护和修缮,反而私搭乱建、出租以牟利;二,现有居民的搬迁腾退,难度显而易见。对此,专家建议,当前可行的保护策略,是在理清清华园近代住宅历史、明确各类故居以及名人故居存量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全面实施“挂牌保护”。

尽管清华的早期建筑类型十分丰富,但目前仅有作为教学设施的主要建筑——清华学堂、大礼堂、科学馆,以“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的名称,于2001年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近代住宅尚未列入。因此,专家建议,应对清华近代住宅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残损勘测与研究,划定亟待保护的近代住宅区域,进而设立形式规范、内容详实的保护标志说明牌(实物不存者的历史信息同样挂牌说明),有计划地组织实施居民普遍参与的近代住宅保护活动,在可能的条件下整合校园中其他相关文物,建立主题各异的小型展馆。同时,制定《清华园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对清华园近代住宅与名人故居进行系统研究、科学规划、系统保护与合理利用,进而纳入北京市名人故居保护的整体框架,将从制度体系上推进清华园近代住宅及其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与有序传承。

清华大学校园内诸多富含历史信息的名人故居,遭遇私搭乱建,并被随意出租,保护状况不容乐观。这样的消息,读来令人揪心。而据介绍,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因为“它们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所以目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又是一个“并非文物保护单位”!此前,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故居惨遭拆毁,施工方的理由也是“这里并非文物保护单位”。而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此处并非“文物保护单位”,在事发现场,当地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阻其施工之时,言语之间似乎都少了些底气,尽管他们内心或许同样认同,这梁林故居确有保护价值。

是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似乎已经成为一些地方行政管理,判断是否应该介入文物保护事件的唯一标准。也正因此,即使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有价值的名人故居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野蛮推平,却只能默不作声;即使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有价值的名人故居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野蛮推平,却只能默不作声;即使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有价值的名人故居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野蛮推平,却只能默不作声。在这样的观点看似有理,实则却有高权之处。保护文物固然应该“依法行政”,前提却一定是“有法”可依。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体系建设尽管取得了长足进展,却仍然存有不少空白。与此同时,随着保护理念的更新以及文化遗产内涵与外延的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客观上也需要不断调整——比如,10年前,破败失修的老厂房还被许多地方的施政者看成是负担、累赘;10年后,它们却成了一些城市引以为傲

依法行政不能成为不作为的借口

思哲

的亮丽风景,成了能够为当地带来多重价值的“聚宝盆”,洛阳等许多城市还制订了专门的工业遗产保护办法,出台了加强保护的具体措施。在一些领域尚无“法”可依,恰需要以实践为基础制定出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的情境下,却偏执地要求依“法”行政,无疑是跳进了自设的陷阱。

文物保护应该依法行政,同时也需要积极作为。在一些地方,对于尚未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却偏执地要求依“法”行政,无疑是跳进了自设的陷阱。文物保护应该依法行政,同时也需要积极作为。在一些地方,对于尚未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却偏执地要求依“法”行政,无疑是跳进了自设的陷阱。文物保护应该依法行政,同时也需要积极作为。在一些地方,对于尚未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却偏执地要求依“法”行政,无疑是跳进了自设的陷阱。

果确实认同那些尚未获得“法定身份”的文物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相关部门就应该加快制定保护措施的步伐。应该在尊重专业的基础上,加快核定进程,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点尽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纳入保护体系之中。如此,才能有效避免诸多未定身份的文物点被有意或无意地抢先破坏。

菏泽古沉船转入室内修复阶段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获悉,随着8月7日船锚、锚链的完整出土,去年9月份在菏泽发现的古沉船的田野考古工作全面结束,转入室内修复阶段。

据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介绍,依据有关专家对沉船中所出土遗物多为元代后期的鉴定结果,将这艘船的年代定为元代。这艘沉船是目前在山东省内河流域发现的元代沉船中保存较好、较大的一艘,在全国也属罕见。同时,这也是国内首次出土船锚带有完整锚链的沉船。这艘沉船的出土为研究元代造船工艺提供了真实的实物标本,同时对于菏泽古代的河运、漕运、环境变迁等研究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考古工作者在古沉船船舱内清理出文物118件,今年5月25日古沉船整体起吊运至该博物馆

后,在船体下及周围又出土部分文物。从沉船中清理出瓷器、铜器、铁器、玉器、金器、漆器、木器、藤编器、竹器等共计127件(套)。有宋代铜钱、寿山石降龙、浮屠罗汉、镶绿松石金耳坠、铜镜、荷叶纹玉洗、饰“辛卯年何家造”铭纹漆碗、饰“天地日月 国王父母”铭纹青石牌位、木质尺子、铜权、铁剪刀、藤框、骰子等。

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负责人表示,古沉船的工作已进入室内清理和修复阶段,出土的铁锚及锚链也已运到菏泽市博物馆存放。船上木器、竹器、漆器都需要较长时间的脱水、整形和修复工作,断成3截的船锚铁链和铜器需要进行除锈和修复,变形严重的船体也需要进行修补、加固等工作。菏泽市计划邀请湖北、陕西和山东省文物专家一起,共同进行古沉船的修复保护工作。

(袁军宝 郑 茜)



阿尔贝罗贝洛是意大利普利亚大区巴里省的一个小城,城内的圆顶石屋建筑技术中无灰泥建筑技术的典型代表,该技术在这一地区仍然沿用。圆顶石屋由从附近采集来的石灰石石块粗糙堆砌而成,撑起金字塔形、圆锥形或球状的屋顶,这种独具特色的建筑群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是阿尔贝罗贝洛一间内部未粉刷的圆顶石屋,可清楚看到其堆砌的方式。新华社记者 王庆软 摄

红色遗址“徐氏宗祠”保护路在何方

本报实习记者 徐梦菲

江西省宜黄县东陂镇黄柏岭村,地处宜黄、宁都二县交界处,四面环山,总面积为2.2万亩,距县城55公里,交通便利。这里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草鞋岗战役”的主要战场。位于黄柏岭村的“徐氏宗祠”,曾是一处重要的红色遗址。一个偶然的机

会,记者走访了黄柏岭村,却发现“徐氏宗祠”正面临着保护艰难、开发利用不足的困境。1933年3月,国民党纠集3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方军区进犯,蓄谋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总部获得情报后,诱敌深入,至江西宜黄东陂镇黄柏岭村草鞋岗一带,布袋设伏。朱德、周恩来等在该村“徐氏宗祠”亲自指挥了这场战役。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红军一举歼灭了敌第十一师全部、敌九师一个营,打伤敌师长一名、旅长两名、团长一名,俘虏敌方官兵6000余人,缴获步枪5000多支,机枪和自动

步枪百余挺,彻底粉碎了敌军第四次反“围剿”。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草鞋岗战役”。此次战役,在《毛泽东选集》、《聂荣臻回忆录》及一些重要革命书籍中均有记载。

“草鞋岗战役”的指挥所,便是黄柏岭村的“徐氏宗祠”。“徐氏宗祠”始建于清嘉庆年间,距今有300多年历史,是具有典型江南地区明清时期建筑风格的古建筑,其高墙深巷、飞檐翘脊、雕龙画凤。庭院内部,木刻、砖雕、石雕古朴典雅,栩栩如生。战争期间,朱德、周恩来等都曾在此休整、办公、会客,并多次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作为黄柏岭

“草鞋岗战役”红色遗迹的代表建筑,同时也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文物,新中国成立以后,徐氏宗祠一直是抚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胜地。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徐氏宗祠”,同很多历史遗迹、红色遗址一样,面临着保护艰难、开发利用不足的困境。因为自然灾害的侵袭,“徐氏宗祠”部分房屋已经倒塌,损毁十分严重。村民们只能自发地捐助修建,可是杯水车薪,它们大都因为投入不足而显得陈旧不堪。“红军后方医院”“红军居所”等更是山墙倾颓、布瓦破碎,楼梯腐朽、

后檐斜塌。从保护的角度来看,黄柏岭村红军遗址是一个整体,无论其中的哪一小块坍塌或者变迁,都会影响整体的历史价值。过去,由于整体规划不科学、资金投入太少,幸存的某些房屋改的改、修的修,七零八落、面目苍夷,如果再不采取得力措施保护,这片红色遗址很快就会有名无实。

专家指出,国内不少红色遗址的现状都和“徐氏宗祠”类似,这反映了人们对历史遗迹保护的社会意义认识不够,同时,开发利用“红色资源”的思路太过单一。历史遗迹的不可再生性,这就决定了历史遗迹保护和开发利用

环节的复杂性。世人大都只看到它表面的经济价值,往往忽略它内在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因此造成红色资源保护、开发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为了实现最大的经济利益,对历史遗迹乱改乱修、随意移动,把一个真的遗址硬生生改造成不伦不类的“赝品”。

另外,历史遗迹保护一直以政府投资为主,这一惯性思维模式框住了红色遗址的保护思路。面对日益破旧、坍塌的历史遗迹,管理者除了打报告等待上级文化部门的资金投入,很难主动出击寻找新的、合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新方法,红色遗址的保护也就这样一次次次坐失良机。

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一史前文化遗址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博物馆了解到,日前由阿拉善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阿拉善盟史前考古调查队对额济纳旗达里呼布镇周边的沙漠进行了一次考古调查。这次调查新发现了一处面积较大的史前文化遗址——巴彦陶来遗址。

据阿拉善博物馆工作人员边文利介绍,巴彦陶来遗址位于达里呼布镇东南约40公里处的巴彦陶来农场内,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80米,面积约20000平方米,四周被高大的沙丘所包围,地

表不见沙生植物。

由于长时间受风沙侵蚀,遗址破坏比较严重,大量的石器残片、陶片和动物骨骼碎片散落一地。据初步估计,遗址四周的沙丘下应存在部分被叠压的遗迹。

从地表所采集的部分遗物看,遗址的文化内涵较丰富。陶器类遗存多,并有大量彩陶,还发现石核、石片、石铤等石器。

据介绍,这个遗址的发现,初步证明了额济纳黑河流域在史前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但遗址的具体年代及文化属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邓 华)